

台美中關係 探源

阮銘・張怡菁 著

余英時・Arthur Waldron 推薦

歷史的 錯誤

*A history of no return:
on Taiwan,
USA and China relation*

美國和自由國家的全球戰略
導致對台美中關係的歷史錯誤，
是怎樣一步步形成的？
這一重大歷史錯誤如果繼續「維持現狀」不予改正，
將會造成怎樣的歷史災難？



玉山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阮銘，張怡菁著.

-- 初版. -- 台北市：玉山社，2006〔民95〕

面； 公分.--（政治；1）

ISBN 986-7375-59-9（平裝）

1. 兩岸關係 2. 美國—外交關係—中國

578.522

95000589

購買玉山社書籍的方法

◎請上玉山社網站查詢書籍（享有優惠），並直接向我們選購。

網址：www.tipi.com.tw

傳真電話：(02)2775-3776

◎請向國內各大書局詢購。

◎請直接到郵局劃撥，帳號：18599799，戶名：玉山社出版事業（股）公司。

◎請親自到本社購買。

地址：台北市106仁愛路四段一四五號三樓之二

政治 1

歷史的錯誤 台美中關係探源

作者——阮 銘 張怡菁

發行人——魏淑貞

出版者——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106仁愛路四段一四五號三樓之二

電話／(〇二)二七七五三七三六 傳真／(〇二)二七七五三七七六

電子郵件信箱／tpi395@ms19.hinet.net

玉山社網站網址／<http://www.tpi.com.tw>

郵撥／一八五九九七九九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編——蔡明雲

執行編輯——許家旗

法律顧問——魏千峰律師

排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刷——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六年二月 初版二刷——二〇〇七年十月

定價——新台幣四五〇元



玉山社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14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港台書

台美中關係 探源

阮銘・張怡菁 著

余英時・Arthur Waldron 推薦

歷史的 錯誤

*A history of no return:
on Taiwan,
USA and China relation*



D 829.7/2
20098

美國和自由國家的全球戰略
導致對台美中關係的歷史錯誤，
是怎樣一步步形成的？

這一重大歷史錯誤如果繼續「維持現狀」不予改正，
將會造成怎樣的歷史災難？

序

現狀下的均衡

余英時

——當前台灣、大陸、美國的三邊關係

阮

銘先生到台灣任教以後，我和他已多年沒有聯繫了。前幾天他回到美國，我們才有一次交談的機會。他告訴我，這幾年他一直在教一門台、美、中關係史，剛剛完成了一部《歷史的錯誤——台美中關係探源》的專著，並且很懇切地希望我為此書寫一篇序文。

這一領域雖不在我的專業範圍之內，但這五、六十年中、美關係的演變，卻是我親見親聞的歷史；所以我抱著很高的興趣讀完了他的全稿。現在讓我把我一點讀後感寫在下面，以答阮先生索序的雅意。

首先我要指出本書的幾個特色。第一、作者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對於民主和自由的追求到了「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的境地。他在本書中毫不隱諱地偏袒台灣，正是因為他十分珍惜在台灣建立民主體制方面所取得的空前成就。第二、作者

對於中共作為一個權力集團的本質具有最深切的體認；對於中共幾代的領導人也有直接或間接的認識。自一九七九年美國與大陸正式建交以來，中共便利利用美國聯抗蘇的急迫心理，用盡一切心機要把台灣收入囊中。作者引中共內部資料與美國外交人員回憶錄互相印證，對這一點極有澄清之功。第三、本書處處都流露出作者對台灣安危的憂慮。他只怕美國政府受利益集團的包圍，最後以台灣為代價，換取中共的「合作」；他更擔心台灣出現「親共」的勢力，裡應外合，斷送了一個剛剛開始茁壯的民主社會。這一論點貫穿全書，可以說是一條主線。讀者必須從這一特殊的角度去理解作者的用心。

我已多年不寫有關時事的文字，現在也不想破戒。但是對於海峽兩岸局勢的演變，我仍然一直在注視之中。下面我願意極其簡略地提出幾點觀察，以供參考。為了與本書論旨相輔相成，我的觀察完全從現實出發，不涉理想的層面。

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障。台灣人民能通過普選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基本上決定了在可見的將來，兩岸之間的關係仍然祇能維持現狀。什麼叫做「現狀」呢？一句話，大陸存在著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台灣則存在著一個「中華民國」，雙方都堅稱自己是「獨立的國家」。這個「現狀」始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至今依然未變。「維護中華民國的獨立主權」是國民黨的一貫立場，過去

執政時期固然如此，現在雖已在野，也並未宣佈放棄這個立場。民進黨內明顯地具有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與傾向，然而執政六年還是依托在「中華民國」的名號與憲法架構之下，沒有突破性的舉動。這種情勢似乎反映一個基本事實：台灣民意的的主流是「維持現狀」，以致兩黨都不能採取偏離民意太遠的政策。一般地說，普通人民大致都希望過一種自由自在、免於匱乏的正常生活，要求他們在政治上走向極端是不大可能的。所以支持所謂「藍營」的選民也許期望兩岸關係趨向和緩，以至進行經濟、文化的交流，但是如果中共堅持香港式的「一國兩制」，要求他們拋棄現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接受中共直接或間接的統治，我想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是會斷然拒絕的。去年（二〇〇五）十二月，香港居民二十多萬人上街爭取「普選」便是一個眼前的例子。對比之下，台灣居民已正式取得自作主宰的權利，依普遍人性作判斷，他們不可能不珍惜這個基本權利。同樣的，支持所謂「綠營」的選民也許十分重視台灣的主體性、獨立性，但是如果期待他們都情願將身家性命為賭注，在政治上作孤注一擲，恐怕也超出了常情。

總之，據我個人的觀察，台灣至少有半數以上的人是傾向於維持現狀的。通過投票，他們是決定台灣何去何從的最後力量。所以我說，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的保障。

台灣之所以有安危的問題，其根源當然是大陸的中共政權。自尼克遜與中共簽訂《上海公報》以來，中共方面便堅持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必須收回。共方雖向美國承諾儘量以和平的方式「統一台灣」，但始終不肯放鬆「用武力」的一條尾巴。我們都知道，在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中共談判中，共方一再強調絕不能容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公式；前者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並存，後者則指台灣的「獨立運動」。我們也都知道，後來中共在香港實行的所謂「一國兩制」，便是為了引誘台灣人入彀而特別設計的。到目前為止「一國兩制」仍然是中共的唯一的「統一」綱領，台灣如果想與大陸和平共存，首先必須交出「主權」。

中共究竟會不會對台灣動武呢？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答覆，包括中共的最高領袖在內。大陸這幾年來在經濟上的快速成長，似乎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另一超級大國。專制政權的武力加上經濟勢力，這是名副其實的「如虎添翼」。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以後，台灣和香港的商人乘虛而入，大量投資，是大陸經濟起飛的始點，使一度搖搖欲墜的大陸企業界緩過氣來。今天台灣的經濟已牢牢被吸在大陸這塊碩大無朋的磁盤之上，恐怕再也不能自拔了。正因如此，這幾年來中共在「統一台灣」的策略上也相應而有所調整。在威脅與利誘雙管齊下之外，中共似乎正在有

計劃地通過文化與政治的方式在台灣進行全方位的「統戰」，以期收到徹底分化與瓦解台灣心防的效果。不戰而屈人自然是最上乘的策略。

但是經濟發展也給中共製造了巨大的政治與社會危機。中共的專政機器最近雖有越絞越緊的明顯傾向，如暴力鎮壓農民的集體抗爭，查封或改組真實報導的報刊、嚴密監控網路等等，然而由國際投資所帶來的暴富也對專政機器起著全面的腐蝕作用。首先是這架機器的操作者——整個幹部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從高層到低層，已深陷在貪污與腐敗的泥淖之中。幹部中有操守的人，由於妨礙了貪贓枉法者的利益，在這個系統中往往無法存身。專政機器本身的腐蝕不可能不影響到它的控制能力，社會秩序已很難有效地維持了。其次，暴富並沒有為正常的中產階級催生，也沒有形成多元社會，然而確使大陸複雜化了。貧富的兩極化已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共這十幾年來的最高指導原則；這些「先富起來」的人都集中在沿海各大城市，其中極大多數的巨富都是所謂高幹的子女、親戚、故舊之類。在「黨天下」統治之下，資源完全控制在各層級的「黨書記」手上，毫無憑藉而白手起家的，祇能是少數例外的奇蹟。此外，中富、下富之流大致也無不具有中幹、下幹的背景。即使外商去大陸投資，也必須先與當地掌權幹部建立良好的關係。一般而言，這種關係是建立在「賄賂」的基礎之上，美國

報紙已一再討論美商在華公司的「賄賂」是否合法的問題。台商在大陸者有百萬人以上，他們如果肯說真話，這是不難求證的。這一畸形的市場體制必然導致財富分配的極端不均，不僅個人與個人之間如此，城鄉之間與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之間更普遍地如此。今天大陸上各大城市都十分繁華，顯得活力無窮。偶而到這些大城市作短期逗留的訪客或遊客，幾乎眾口一辭地驚羨不置，這是因為整個社會結構底層的亂源永遠在他們的視線之外。

說到亂源，我必須提一提大陸各地村民的集體抗爭。這種抗爭越來越多，也愈演愈烈，近一、兩年在全國範圍內每年不下六、七萬起。去年（二〇〇五）十二月初廣東汕尾市武警用機關槍掃射抗爭村民，更是震動世界的事件。我在東京機場已讀到日本各大報的記載，回到美國後又在報紙和電視上一再看到更詳細的報導。官方僅承認打死三人，但村民則堅稱死亡在二、三十人以上。死亡人數姑且不論，國外新聞評論都強調：這是「六四」天安門屠殺之續。這才是關鍵所在。一般而言，農民集體抗爭集中在兩個主要問題上面，一是環境污染，二是耕地權被剝奪而得不到應有的補償。總之，其根源都在不顧農民死活的經濟發展。結果造成一億左右城市居民「富起來」而八億農民則日益貧困。再加上下崗工人越來越多（最近《紐約時報》指出：這一年來從破產國營企業下崗的工人有六千萬以上，而外資企業所能

吸收的工人則祇有一千六百萬），和上億的民工受盡地方政府和資本家的剝削，大陸的社會動盪真令人處處觸目驚心。這不是中共「和諧社會」的空論能夠化解得了的。

農民之所以採取集體抗爭的方式是「官逼民反」的結果。他們受了官商勾結的欺壓之後，投訴無門。司法完全是地方黨政人員的工具，民告官的案子一概不予受理。他們曾一度寄望於黨中央為他們作主，因此而出現了所謂「上訪」的現象。據說北京的「上訪村」有過幾十萬人的盛況。但「上訪」的案子太多，中央無法應付，仍然退回原地方處理，其結果不問可知。這是農村普遍不安的主要原因。北京政權已察覺到這一形勢的嚴重性。去年年底，汕尾屠殺之後，溫家寶在黨內集會上特別警告「在土地問題上絕不能犯歷史的錯誤」。他直率地指出：「在有些地區，非法奪取農地而不予合理的賠償激起了抗爭。這是農村，甚至整個社會不安定的一个重要根源。」（見《紐約時報》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一日A3）可見胡、溫上台後所宣揚的「縮小貧富距離」政策，並未生效。過去兩年中共廢除了農民的糧稅，可以說是一項「德政」。但溫家寶又說，這一「德政」也有落空的危險，因為地方官員又以及其他「名目」向農民徵收苛捐雜稅。我們早就知道今天大陸的各級政府普遍流行著「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風氣，中央政令未必能出北京城，上級決定也不

見得能為下級所奉行。現在溫家寶的講話則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中共上層也面臨一場極大的隱患：第三、第四代接班人都不是鄧小平指定的，因而平穩渡過。但第五代接班轉眼即至，逐鹿者必須及早佈置，新一輪的權力鬥爭已呈山雨欲來之勢。所以專就大陸內部的問題說，中共的危機感已十分緊迫，「統一台灣」是不是在它的議事日程中排得上第一優先的位置，至少是值得懷疑的。

最後，美國與海峽兩岸之間的關係也不能不略交代幾句。作者在全書終結處表示了一個願望：美國現任總統小布希訪問台灣，向爭取自由最有成績的人民致敬。我很理解他的想法，但是從政治現實的角度看，我認為這個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對大陸和台灣的關係也祇能維持現狀；這個現狀則早已由《上海公報》和《台灣關係法》規定了下來，暫時還看不見任何轉變的跡象。在過去幾任美國總統之中，祇有雷根是唯一對台灣有個人同情的人。他在一九八〇年競選時提出與中華民國恢復正式邦交的主張，一時使鄧小平甚為緊張。雷根本人的傾向確是如此，並非政治說詞。但是他入主白宮之後，受到國會以及國務院的牽制，最後還是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小布希對台灣民主成就的讚揚也是真誠的，但他陷在反恐戰爭之中，又為伊朗、北韓的原子彈問題所困擾，處處需要中共的「合作」；加上美國企業界在大陸投資既廣且深，他已不可能作出任何驚人的舉動。

但是今天已和柯林頓時代不同，美國朝野不再一味討好中共，視台灣如敝屣。這是因為中共這兩年來在國際上到處張牙舞爪，一方面爭取與一切反美力量結盟，明擺出一副爭霸的姿態，另一方面又去各地搶奪油源，大有在經濟上與美國一較高下之勢。美國人嘴上不說，但一切都在眼裡。所以「中國威脅論」的興起不是偶然的，也不會很快地消失。在這一新形勢下，美國必須在兩岸之間維持一種微妙而機動的均衡。所以「維持現狀」最符合美國當前的利益。但「現狀」不是僵死的，其中大有活動的餘地。《上海公報》和《台灣關係法》兩個文件也有如何解釋、如何執行的問題，一切將視局勢的推移而動。

總結地說，台灣、大陸、美國之間基本上存在著一種均衡的關係；祇有三方都維持現狀才能穩定這一均衡，任何一方有意外的舉動，均衡便打破了。

台灣的安危最後祇能靠自身的努力來決定。台灣雖然不能不爭取美國的支持，但絕不可存一切依靠美國之念。我已指出，民主制度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障。然而我也要指出，這個制度目前尚未達成熟之境，在與民主相偕而來的文化品質方面，尤待提升。這也許是最近將來，台灣應該努力的主要方向。

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導言

從錯誤中學習

林蔚 (Arthur Waldron)

我

是一個美國人，大學畢業後研究中國已有三十五年。在國際關係上，我們美國人總認為自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特別是，站在自由與民主的一方。

平心而論，有時確實如此。但是，正如阮銘在本書中所闡述的，我們美國人也曾一再助長高壓強權之氣燄，而對自由民主陣營造成傷害。

令我汗顏的是，阮銘在書中精確地描繪出一幅美國在外交上令人憂心卻清楚無比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歌頌自由的言論響徹雲霄——從威爾遜總統以降，包括羅斯福、甘迺迪、卡特，到柯林頓，美國歷任總統幾乎無不誓言捍衛自由——但最後自由不是淪為口號，就是在執行上出差錯，結果適得其反。

美國這種自我矛盾的外交模式最惡名昭彰的近例，當屬二戰結束、日本投降以來這六十年當中，美國對中國及台灣的外交政策。

當今全世界非自由的人民多數居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比起一九七六年前毛澤東時代的恐怖鎮壓，今天許多人的生活比過去要好。但是嚴格來說，絕大部分的中國人仍然極度貧窮。他們在法律或政治上毫無權力：法院形同虛設、所謂的選舉更只是騙人的玩意。而在其他國家，毛澤東死後這三十年來，自由卻有蓬勃的發展。東歐前共產國家獲得了自由；俄國雖然尚未真正自由，但已非共產國家；蒙古、南韓、菲律賓、台灣及其他亞洲各國已經成為民主國家。

相反的，中國共產政權一方面極力爭取外資，讓貧窮而無自由的中國人民為出口企業賣力，一方面卻清楚表明它對政治自由化毫無興趣。其實，要不是中國政府從全世界賺取的大把鈔票，共產主義也許早就在中國崩解了。然而，外國的貿易和投資，加上外國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政治支持，年復一年，就像為瀕死的病人輸入鮮血，讓其得以苟延殘喘。

美國目前扮演的角色不但助長中國共產主義、傷害中國人民並威脅其鄰國之自由，但這卻非特例。正如阮銘書中指出，從《雅爾達密約》開始，美國在亞洲一直是說一套、做一套。雖然滿口理想主義，但行為卻完全相反。在阮銘眼中，美國的軟弱是造成中國共產黨崛起並與蘇聯結盟的主因，而美國並非弱在資源不足，而是弱在缺乏意志力及理解力。若非美國示弱，慘烈的韓戰或許可以避免。蔣介石對台

灣獨裁統治，卻受華府支持。但當這個獨裁者的兒子蔣經國及其繼任者開始實行民主化，美國不但沒有給予支持，一九七九年號稱美國「人權總統」的卡特政府甚至企圖強迫台灣人民接受中國統治。直到今天，華府仍有人存此企圖。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老布希總統一邊假惺惺地譴責共產黨殘殺同胞，一邊卻秘密去信向北京重申保證，並派遣高官向鄧小平致意。柯林頓擊敗老布希當選總統時，高舉自由主義大旗，誓言捍衛民主自由。但是中國很快就令柯林頓妥協，柯氏不但同意將人權與貿易脫鉤，還承諾進一步削弱台灣。

如果美國勢單力薄，以上種種雖然不可原諒，但或許可以理解。但美國並非弱國。美國過去和現在都是強國，強大到足以犧牲部分貿易利益以支持自由民主。依阮銘之見，這是一個理念上的問題。某些像季辛吉、布里辛斯基之流的美國人以堅定的「現實主義者」自居，對他們而言，自由——或至少，歐洲以外人民的自由不在他們關心之列。他們認為國際關係取決於金錢與武力。其他美國人則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篤信並捍衛民主自由，但他們通常無法將這些理想切實施行。

從漢彌爾頓、傑佛遜時代至今，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兩套價值觀之間拉扯。但在過去那個年代，美國國力仍弱，它的一舉一動對大局無足輕重。然而今日的美國已經很強，它若支持自由，則自由必定得以伸張；

相反的，它若縱容強權暴政，像它在中國及對台政策中的作為，則自由在全世界將愈趨式微。

中國及台灣都須細讀這本書，並汲取其中精義。美國人也該讀此書，因為阮銘也是寫給美國看的，他要傳達的訊息必須傾聽。

這本書是怎麼來的呢？或許我們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當天，美國今日奉行的中國政策就從這天開始。季辛吉在這天啟程赴巴基斯坦，他所肩負的任務有一個頗為偉大的名稱，叫作「馬可波羅一世行動」。尼克森總統身邊少數幾個知情人士當時有三點共識：首先，他們相信中美雙方可以捐棄前嫌，結束韓戰後長期敵對狀態，攜手對付共同敵人蘇聯。第二，許多人相信，此種關係一旦建立，中、蘇、美三邊權力均勢將可成形，如此就算自由仍不可得，亦可確保區域之和平穩定。第三，所有人都覺得「台灣問題」是塊擋路的大石。既然以現實主義者自居，這群美國人決定犧牲當時的盟友台灣，以便發展與中國的新關係。由於不願挑明，他們決定在做法上採迂迴策略，他們深信，只要華府降低對台灣的支持，假以時日，台灣領導人自然會明白，除了向中國投降之外別無其他選擇。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這天，季辛吉（一九二三～）正好遇到沈劍虹先生。季辛吉時任尼克森（一九一三～一九九四年）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而沈劍虹則為中華